

《柳如是别传》和陈寅恪晚年心境

程兆奇

陈寅恪先生自中年起举手投足之间取得的杰出成就，对中国文史学多具经典意义。因此，在常人看来，四九年后寅恪先生在南北史和隋唐史方面进一步作集大成的总结，才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正像他自况的“著书唯剩颂红妆”那样，寅恪先生晚年倾大力研究的却是两位昔时女子，尤其是对钱柳因缘的释证，竟费时十年。于是乎，《论再生缘》、特别是《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动机，就成了聚讼至今仍未结案的一个悬疑。说“仍未结案”，是指一些大陆学者对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的异议，就我来说，我是同意余先生的解释的。我曾在〈也谈陈寅恪〉（载日本《中国研究》一九九六年九月号）中说对余先生的解释是“一心尽倾”，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叹服余先生文章的聪明和大气，但的确也感到在大关节上或者说在方向上余先生的解释是最合理的。所以我在〈也谈〉中说到《别传》时有“让人一见即会顿生疑窦”等语。因为〈也谈〉不是专门的书评，没有详及《别传》，因此文章刊出后，有些读者来信，希望能有具体的论证，有些则迳说若非如此未免会予人以“有色眼镜”的印象。其实，我的看法并非对余先生观点草率地附会，而是反复恭读《别传》并参以寅恪先生晚年其他著述为根据得出的。

《别传》有没有它意？或者说是不是暗喻今事？确很微妙。下引十分引人注目：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民之心，而壮清廷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即徐闇公辈亦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至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仍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为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尤有可能。……（一一八三页）

这样的话，摆在“反攻大陆”的年代，又是出自像寅恪先生这样对时事也十

分敏感的人之口，古典中不含今情，恐怕说不过去。

寅恪先生在壮年时一些述及南北朝的著作中，常常以“东南正朔”对待南朝，从中可见寅恪先生的“正统”观念。《陈寅恪文集》的〈出版说明〉说寅恪先生“尚未摆脱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如果指这些方面，还算差强人意。同样，寅恪先生在晚年著述中也表现出了他的“遗民”心态，只不过在这点上“传统士大夫思想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显著和充分。有鉴于此，余先生等时贤已有不少探讨，这里不必再重复。在此仅随便抄录几段《别传》中语，来看看寅恪先生的兴亡之叹和爱憎之情。

“东海扬尘”“西台恸哭”。亡国遗民之语，不忍卒读。（二二三页）

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二五一页）

噫！卧子抗建州而死节，辕文以曼殊以荣身。孔子曰：“不有祝驼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岂不诚然哉？岂不诚然哉？（一三九页）

后之读阶令之诗词者，当益悲其所抱国家民族之思不独个人身世之感矣。（四八二页）

寅恪昔年尝见三桂叛清时招诱湖南清将手札，署名下钤一章，其文为“月所”二字。初视之，颇不能解，后始悟“所”之本义为“伐木声”。见说文解字斤部。旧说为月中斫桂者为吴刚。见酉阳杂俎天咫类。故三桂所说“月所”与其姓名相关联。吴氏之以“月所”为称，不知始于何时。若早有之，则可谓后来杀明永历帝之预兆。若桂王被害以后更用此章，是以斫桂自许，狠毒无耻，莫以复加，当亦洪亨九之所不为者也。（七七一页）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一一一九—一一二〇页）

“促坐不需歌出塞，白龙潭是拂云堆。”二句，谓当时置酒于白龙潭上，而白龙潭所在之松江，已归清室统治，与塞外拂云堆无异。己身与霞城辈之身世，亦与王昭君相似。其感慨沉痛，实有甚于白乐天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句，

及东坡“定惠院海棠”诗“天涯沦落俱可念”者矣。（一一二—一三页）

寅恪先生在行文中还每有“不忘故国旧君者”（如八五二页）“痛哭言之”（如一八一页）之类深情的流露。如果对亲历的兴亡麻木不仁，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怎么说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寅恪先生所处的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对现实的兴亡倾述感慨的环境，他只能寄情于故往，而三百年前那场悲情味最重的王朝鼎革，也确实最能使出于相同或相近氛围中的人发出感同身受之叹。我们不妨再看看寅恪先生是如何来述说当年钱谦益等遗民的地下活动的。

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藉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此烟幕弹耳。（八五页）

牧斋顺治十一年至苏州，阴为复明运动，表面则共诸文士游宴，征歌选色，斯不过一种烟幕弹耳。（一〇七—一三页）

有学集诗注陆此年春间之诗有“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大抵为与当日南京暗中作政治活动者，相往还酬唱之篇什。其言就医秦淮，不过掩饰之词，自不待辨。（一〇八—一〇六页）

“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又若西京宿好，耳语慷慨。北里新知，目成婉娈。酒阑灯屑，月落乌啼。杂梦呓以兴谣，蘸杯盘而染翰。口如衔饴，常思吞吐。胸似碓舂，难明上下。语同阴迷，词比俳优。传云，惟食忘忧。又曰，溺人必笑。我之怀矣，谁则知之？（一一〇—一〇六页）

……意谓宴席间与座客隐语戏言，商讨复明之活动，终觉畏惧不安，辞不尽意也。（一一〇—一〇八页）

“秋灯依约霓裳影，留与银轮伴寂寥。”二句，意谓今夕吾辈之文宴，实聚商反清复明之事，聊可告慰于永历帝也。（一一二—一一二—一三页）

放“烟幕弹”，制造种种“掩饰之词”，藏颠覆谋议于“隐语戏言”之中，虽时隔三百余年，寅恪先生仍洞若观火。寅恪先生既然能够观之于古往，我们就不必怀疑他同样的可以用之于今日。

寅恪先生在说到柳如是大年夜遣人送“徐三公子”回家时说：“于此亦足见

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七十页）寅恪先生还在说到柳如是初赠钱诗有“江东风流物论雄”“东山葱岭莫辞从”句时说，“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而且“胸中衬度，毫厘不爽”（三一三页）。其实，论“用心之周密”，论“胸中衬度，毫厘不爽”，寅恪先生是最当之无愧的了。在“就医秦淮，寓丁家水阁绝句三十首”之二十一“江草宫花酒泪新…”和“明士张君文士墓志铭”考释后，寅恪先生说：“总之，牧斋学问固极渊博，但此文亦故作僻奥之句法，藉以愚弄当日汉奸文士之心目耳。”（一〇九四页）这句话很妙，简直可说是泄露了天机，它不仅对通解《别传》十分重要，也可视其是寅恪先生整个晚年诗文的一个极好脚注。寅恪先生以故事述今怀，何尝不是在愚人心目呢？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寅恪先生晚年是生活在一个从箝口到诛心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许多在正常社会里可以正常抒发的情感，尤其是诸如兴亡之叹，爱憎之情，都成了必须避讳的禁忌。如果看不到这一点，而仅仅以常理常态推度，那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当然，寅恪先生的晚年诗文既然别有深意在，就不可能尽瞒天下人之耳目。早在五三年汪钱解〈改旧句寄北〉就说有斥责旧日学生皈依马列、讽刺郭沫若、骂苏联等意，可谓知师莫过于徒。汪钱的叛师自属可悲，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知情者的证明：寅恪先生的确是寓今情于古典的。

如果细检《别传》，寅恪先生不能忘怀于今日还是很有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在述及洪承畴“堂堂督师书赠之匾额（风雅典型），自可高悬于春星堂上，以作挡箭牌”后所发的感慨：“特附记亨九书赠然明匾额一事于此，聊与居今日历事变之君子，共发一叹云尔。”（三八七页）寅恪先生早就说过他所居于其中的“今日”的“非驴非马”，他晚年处身的今日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然不能再有如此的非词。但寅恪先生的本心，还是通过《别传》传达给了我们。比如寅恪先生在考证出杨绛子二十岁上下时薛素素已六十八岁，因此断无可能“共为盟誓，不嫁男子者”时谓：“禹域之外，当今之世，何所不有，或亦可能。至于三百年前崇祯之际，自无此奇事，可以决言。”（四七二页）在寅恪先生眼中的“当今之世”，已是充斥着非我中华所当有、非我先祖之所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当年王国维自沉后，寅恪先生在〈挽词〉和〈纪念碑铭〉中说其原因，是为文化衰落之苦，而非为“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从今天来看，这句话用在寅恪先生身上才更恰当。因为王国维在冯军逼宫时，毕竟已曾怀“君辱臣死”之义，“数欲自沉神

武门御河”。寅恪先生晚年面临的是中国文化旷古未遇的大劫难，他的痛苦自当更为深切。《柳如是别传》作为在这样的痛苦中凝聚成的心血结晶，自然不能和一般的考证著作等量齐观，更不能误把寅恪先生在〈缘起〉中说的检验学力，甚至消磨岁月，当作著作此书的真实目的或唯一目的。如果并非别有企图而仍要执意于此，那就真是有负寅恪先生的一片苦心了。

（原载日本《BLUE》2001年第1期；主要内容曾以回信形式刊于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11月号）